

外交官馬加良埃斯與葡中關係中的澳門問題（1946-1971）

費茂實*

2004年12月13日，馬加良埃斯於里斯本逝世。¹這位外交官在以澳門為集中點的葡中複雜關係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入領事界任職後5年便開始了這一工作，直至1980年，即在退休前9年，才脫離它。限於篇幅，本文只能簡短地分析他在葡萄牙對澳門政策的提出及執行過程中所起的作用。

從駐廣州領事到澳門“文化大革命”期間“靠邊站”

當時他非常關心中國，尤其是廣州的內部政治形勢的不斷惡化，及其對澳門的影響。那時還是“新手”的馬加良埃斯於1946年5月31日被任命為葡萄牙駐廣東省會的領事 (Portugal, 1981, 365)。

他從波斯頓返回里斯本，來接受葡萄牙外交部高級官員的指令。1946年6月，在他同外交部臨時秘書長馬提亞斯的會晤中，“告訴我說，澳門的情況的確使人非常不安，因為在廣東不斷有民眾的遊行示威，要求將澳門和香港歸還給中國。還對我說，國務委員會主席對我們是否能夠在澳門再呆很長時間持有懷疑的態度……他強調說，只要我能改善情況，將得到外交部的欣賞。外交部給我行動的自由” (Magalhães, 1992, 1)。

在1946年10月至1950年9月期間，他出任了葡萄牙駐廣州領事這一艱難的使命。廣州位於澳門以北126公里。鑒於葡萄牙中央政府當時希

* 里斯本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1. José Cutileiro，“紀念馬加良埃斯1915-2004年”，《快報》，第一本，里斯本，第1677期，（2004年12月18日），第29頁及 José Pedro Castanheira，“馬加良埃斯（1915-2004）”，《快報》，第一冊，里斯本，第1677期，（2004年12月18日），第29頁。

望在有關在中國的治外法權，以及有關係約方面加入一涉及澳門的條款，所以廣州的報刊發動了一場對葡萄牙和葡萄牙在澳門的管制的聲討。

儘管馬加良埃斯出面要求中國報刊上的此種討伐降調 (Magalhães, 1992, 49-51, Magalhães, 2004, 151)，但實際上另外一些更令人擔心的因素造成了這一局面。首先由於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內戰，中國的內政越來越惡化。1947年4月1日，上述條約順利簽訂。而且從那時開始，蔣介石政權的首要任務是加緊反對由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共產黨的內戰 (Pepper, 1978, 3-6)。

隨著蔣介石政權的不斷南撤，對澳門的依賴性越來越大。此種情況造成了正趨沒落的蔣介石政權和澳門之間日益增多的迫不得已的“合作”，這為在澳門及廣東國民黨政府之間簽訂的三項條約提供了方便。第一項是簽訂於1948年1月向澳門提供大米的條約 (Magalhães, 1992, 46-47)，第二項是3月簽訂的金融協定 (Magalhães, 1992, 48)，最後一項是簽訂於同年5月的“海關條約” (Magalhães, 1992, 48)。這些條約，尤其是最後一項引起了里斯本的疑慮，因為這種“日益的合作”不太合時宜。葡萄牙的初衷是繼續保持在澳門的存在，因為中國共產黨現在距奪取中國大陸政權已經僅差幾個月時間了。

由於共產黨的勝利，儘管他一再堅持要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馬加良埃斯滯留於廣州 (Magalhães, 2004, 156-157)。然而責任不在於新的中國當局，而是由於葡萄牙政府的疏忽，以及葡萄牙外交部某位高級官員耍的手段 (Magalhães, 2002, 83)。他於1950年9月18日離開廣州時，將領事館的事務託付給當時領事官員米格爾。²

他於1950年9月從中國返回後 (Magalhães, 2002, 83)，在1951年6月被任命為葡萄牙駐控制向蘇聯集團出口協調委員會的葡萄牙代表。1952年11月又被任命為中國委員會的代表 (Magalhães, 2005, 81)。他擔任此二職近5年時間，認為“這是我所接受的最難的使命之一”，因為

2. 馬加良埃斯1950年9月18日致葡萄牙駐上海總領事西美恩第134號公函，載“Proc. 12/50”，Arquivo do Consulado-Geral de Portugal em Xangai，M. 46，AHDME，Lisboa。

“在澳門所發生的對禁運的破壞引發了美國、英國和法國的不斷揭露” (Magalhães, 1992, 78)。這一形勢損壞了馬加良埃斯同澳門葡萄牙政府之間的關係，因為後者提供的了關於這方面情況的不實資訊。同海外部的關係也有所惡化。該部說他“不過是澳門政府和外交部之間的郵箱 (Magalhães, 1992, 78)。”

為了緩和美國、英國及法國的強烈揭露並減輕當時澳門政局的緊張局勢，在1952年邊界衝突之後，馬加良埃斯主持了在里斯本同美國的直接談判。於1954年3月企圖為澳門“網開一面”。此次談判受到了海外部長的阻撓，他企圖避免一切對澳門同毛澤東政權的商業貿易的監察行動 (Fernandes, 2004)。總而言之，在他出任這兩個秘密使命，處理澳門問題的5年當中，他同澳門政府及殖民/海外部發生了針鋒相對的矛盾。

這些純屬個人方面的態度和原因也許造成了他在1966年至1968年席捲澳門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在外交部受到了冷落。根據他自己的看法，當時外長所援引的官方藉口是，因為外交部內主管許可權的不同，尤其是政治事務總局和經濟事務總局之間的許可權 (Magalhães, 1992, 79-80)，但實際上是個人方面的原因。

首先，儘管他跟外交部長諾格拉是大學同學，但兩人的秉性格格不入，馬加良埃斯是一個“和事佬”，然而外交部長卻是一個“好鬥之徒”，且出言斬釘截鐵 (Magalhães, 2004, 161)。“他不具備作為外交官的基本條件，喜歡跟人家抬扛。” (Magalhães, 2005, 62) 其次，外交部長認為他是奧利維拉³的人，而這奧利維拉又是外交部長所憎恨的人。第三，馬加良埃斯對外交部長那種公開的勢不兩立的做法保持著某種距離，“因為他所推行的那一套，即葡萄牙海外政策是人們所無法接受的 (Magalhães, 2005, 162)”。

儘管他受到了外交部長的排擠，然而最後部長也認同了他那錯誤的觀點，即中國在澳門的“文化大革命”是由一個“主要的錯誤”引發

3. 1958-1961 年期間，曾出任商務國務秘書處的一位律師，1961-1965 年出任部長會議助理國務秘書並在 1965-1969 年期間出任經濟部部長 (Lucena, 1999, pp. 631-639)。

的，即“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Magalhães, 1999, 15)。”然而，他們只是在日期上有所分歧。馬加良埃斯一再認為，在1949年或1950年便應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外交部長卻認為應該在1964年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 (Fernandes, 2002)。

可雙方都錯了。無論是在1949/1950年或1964年同毛澤東政權建立外交關係，都無法保證不在澳門發生那場事件。只要考慮一下兩個基本原因：之一，儘管葡萄牙政府在廣州還設有由領事官員兼經理米格爾管理的領事館，還是於1966年被衝擊了兩次。這是造成其關閉的主要原因。而且1966-1967年之間在澳門所發生的事件極度地削弱了葡萄牙政府 (Fernandes, 2002)。之二，儘管英國在北京擁有准外交代表機構，但這也未能夠阻止這一代表機構受到衝擊，而且1967年在香港也發生了十分嚴重的事件 (Fernandes, 2002)。

從未產生的“好處”

馬加良埃斯最後一次處理中國問題，是以外交部秘書長的身份。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企圖加入聯合國。當時的投票非常激烈，需要葡萄牙和以色列的贊同票。

在外交部國際政治機構處秘書長席爾瓦於1971年8月9日向外交部高層提交了一關於聯合國內中國代表權問題的內部報告後，馬加良埃斯他又回到了他1949年便提出的立場。除了撰寫了一份歷史概況，這一問題的發展過程，以及美國、英國和日本關於這一問題的正式立場的報告外，也對葡萄牙應該採取的正式態度提出了一些看法。

至於葡萄牙的正式立場，他認為，傳統的棄權的政策現在已經不能再使用了。鑒於當時對於中國大陸國際政治情況的變化，他建議要求“再次審視葡萄牙的立場。”⁴在此意義上，他要求葡萄牙政治決策者對在聯合國用毛政權代替蔣介石政權投贊成票。當時他為自己立場的

4. “外交部簡記”，希爾瓦編寫，1971年8月9日，第14頁，PEA M. 691，AHDME，Lisboa。

解釋是，如果葡萄牙不改變立場，並考慮到在1966和1968年之間，在葡萄牙管制下的澳門所發生的事件，在澳門有可能因北京政權的准許而發生困難。據席爾瓦說：

“……我們之所以能夠一直在澳門呆著，是因為中國大陸未使用武力驅逐我們。此種‘寬容’，在北京看來，如果我們繼續投棄權票的話，是好心不得好報，因此可能會出現與前些會議截然相反的意義。另外一方面，從此角度而言，可能由於我們的棄權，在北京被接納加入聯合國興奮之際，可能會再次發生前幾年我們在澳門所遇到的困難和暴動。所以必須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因為我們不能忽視一次可以導致結束葡萄牙在澳門主權的內部運動。在理論上可以說，這是一次避免這種事件的機會。”⁵

當時的葡萄牙外交部長，在馬加良埃斯的影響下，開始表現出傾向於改變葡萄牙對此問題的態度。派特利西奧於9月12日在巴西利亞公開宣佈說，“葡萄牙政府將全面地檢討他們對於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所採取的棄權的傳統立場。(Fernandes, 2000, 315)”

這樣，整個注意力便集中到了紐約。1971年9月25日，阿爾巴尼亞和22個亞非國家向聯合國代表大會提出了一項“歸還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合法權益的提案。”

這一文件的執行條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在聯合國的唯一合法代表。”這還包括安理會內。蔣介石的外交代表應該“立即”被驅逐出聯合國以及所有的專門機構。⁶

為保證獲得聯合國成員國三分之二以上的投票，毛澤東政權開始通過澳門中國社團的精英，對澳門葡萄牙政府施加政治壓力，企圖迫使葡萄牙中央政府改變其對接納中國進入聯合國的態度。藉經濟總局兩位高級代表拉梅拉和阿爾梅達在1971年10月第一周訪問澳門之

5. “外交部簡記”，希爾瓦編寫，1971年8月9日，第15頁，PEA M. 691，AHDMNE，Lisboa。

6. 聯合國代表大會，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權利，1971年9月25日”，POI M 520，AHDMNE，Lisboa。

際⁷，何賢的顧問兼翻譯及從1960年8月開始便擔任恒生銀行董事長的崔樂其和當時中華總商會的副會長及澳門市政廳的公共工程委員崔德祺向我們通報說，最好“葡萄牙在下次投票時，對中國進入聯合國投贊成票。同時指出，儘管中國將堅持其外交政策的意識形態立場。中國將在未來非常欣賞並重視葡萄牙贊同中國進入聯合國的立場。”⁸

已經預見到北京會通過澳門給葡萄牙中央政府施加壓力的可能，美國外交部非常成功地說服了葡萄牙領導人，仍然採取贊同支援美國的立場。1969年與1973年之間的美國國務卿羅傑斯於10月20日致函葡萄牙外交部長派特利西奧要求葡萄牙支援美國的決議，將其認為是一項“重要的問題”，即執行三分之二票數的規定。⁹

面對這所有的政治壓力，葡萄牙國家元首托馬斯和政府首腦卡埃塔諾以及葡萄牙外交部部長派特利西奧和葡萄牙外交部秘書長馬加良埃斯於10月21日，在土耳其駐里斯本大使提交國書之後，於國家首腦的官邸貝倫宮召開了會議，以確定葡萄牙的立場。會議期間，考慮了幾種選擇。最後，在馬加良埃斯的提議下，決定葡萄牙政府將支援美國的決議。如果可以達到必要的票數，葡萄牙將投贊成阿爾巴尼亞和亞非集團決議的票，於是放棄了葡萄牙在此問題上傳統的棄權立場。根據葡萄牙外交部秘書長說，葡萄牙政治決策者企圖通過此種立場來獲得中國給澳門的某些“政治好處”（Magalhães, 1996, 39, 2004, 162-164）。

澳門總督仍未獲悉里斯本已經做出的決定，仍然受到澳門華人精英的強烈壓力，因此，他再次同中央政府交涉，要求對阿爾巴尼亞提案投贊成票。當時的澳門總督嘉樂庇將軍於10月22日向當時的殖民部

7. 澳門總督嘉樂庇及妻子為海外部經濟代表團成員舉行了一次盛大的宴會。出席者有殖民部委員若爾熱以及其他葡萄牙在澳門政府的高級官員。“為海外部經濟代表團以及貢薩爾維斯陸軍中校舉行的歡迎晚宴”，消息日報，第25卷，第7139期（1971年10月11日）。

8. “海外部經濟總局秘備忘錄，1971年10月，POI 10.5，2.º vol.; POI M. 520，AHDMNE，Lisboa。

9. 美國國務卿羅傑斯致葡萄牙外交部部長派特西奧公函，1971年10月20日，POI 10.5，2.º vol.; POI M. 520，AHDMNE，Lisboa。

長庫尼亞發了一份電報，通知了何賢向他所傳達的訊息，葡萄牙在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問題上投贊成票，“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很有用，一定會反映到中國未來對我們海外政策的立場，及對那些企圖獲得解放的政黨的支援。的確，不會停止支援，但不會逾越某些界限。”¹⁰

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26屆)第2758號決議獲得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被承認為“中國人民的合法代表”，中華民國(臺灣)政府被驅逐出聯合國及相當數目的專業機構。¹¹葡萄牙及以色列代表團對阿爾尼亞和亞非國家的提議投入了贊成票，同意接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¹²葡萄牙和以色列的贊成票獲得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歡迎。這些國家歷來利用聯合國大會來揭露葡萄牙殖民主義和以色列猶太復國主義(Fernandes, 2000b, 316)。第二天，澳門總督嘉樂庇將軍向殖民部長庫尼亞彙報說，葡萄牙的贊成票在澳門使人十分滿意。¹³

如果說葡萄牙當局企圖以此行動來緩和中國對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政策的批評的話，那麼就錯了。日本朝日新聞社長元五門在評論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及以色列和葡萄牙的贊成票時評論說：“葡萄牙在非洲有殖民地，但中國支援安哥拉、莫三比克和幾內亞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因此，葡萄牙也許會這樣認為：‘我們支援了中國，因

10. 澳門總督嘉樂庇致庫尼亞部長密電，1971年10月22日，POI 10.5，2.º vol.; POI M. 520，AHDME，Lisboa。

11. “第2758（第26屆）號決議。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一切合法權利”，代表大會——第26屆，第2頁，in Internet-<http://ods-dds.ny.un.org/doc/RESOLUTION/GEN/NRO/327/74/IMG/NR032774.pdf> [tema，“United Nations”，subtema，“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s”；subtema2 “resolution 2758 (XXVI)”[01-06-2005]]。

12. 當時的投票非常激烈。儘管葡萄牙投票贊同美國認為這一“重要問題”的提案，但還是以55比59票失敗（“中國大陸在聯合國”，消息日報，第107年，第37945期，1971年10月27日）。第9頁。由於美國提案的失敗，中國大陸進入聯合國只需要簡單多數票。葡萄牙對阿爾巴尼亞及亞非集團的決意，投了贊成票，因此有了76票贊成票（58%），35票反對（27%），17票棄權（13%），三個國家未參加投票（2%）（Kim，1979，p. 513）。非官方的消息日報社論認為葡萄牙所投的贊同票是“返回了現實”（“中國大陸在聯合國”，消息日報，第107年，第37945期，1971年10月27日）。第2頁。

13. 澳門總督嘉樂庇致庫尼亞部長密電，1971年10月27日，POI 10.5，2.º vol.; POI M. 520，AHDME，Lisboa。

此中國不應該在殖民地問題在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內攻擊我們’。然而，我們無法苟同此種看法”¹⁴

一年以後，中國政府對這一立場又予以了重申。為了減弱蘇聯對北京和里斯本之間對於非洲葡語國家獨立戰爭合謀的指控，周恩來當時公開強調了中國政府對安哥拉、莫三比克和幾內亞人民獨立鬥爭的支援。在1972年12月11日，藉幾內亞共和國總理蘭薩納·貝阿沃吉訪問北京之際，為所有駐華非洲國家使團舉行的宴會上，周恩來十分謹慎地反駁了那些關於其政府有可能同葡萄牙、以色列及南非接近的謠言。他聲稱，所有的這三個國家的政治代表了殖民主義、猶太復國主義和種族主義。

根據親北京的《澳門日報》的報導，周恩來當時強調說，中國大陸決不會承認葡萄牙，也不會承認南非，因為“少數白人對非洲人民進行統治，進行戰爭，侵略周圍的國家。南非和葡萄牙進行壓迫，將非洲人民視為敵人等等，中國如何可以承認這些國家？”¹⁵周恩來還強調了中國政府對非洲團結運動、對南部非洲人民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的支援，同時重申了阿拉伯國家在政治上堅持結束猶太復國主義。¹⁶從表面上來看，在招待會期間，周恩來同時也聲明說，澳門總有一天將得到“解放”。¹⁷這一最後聲明，新華社未予以正式的透露，然而後來北京政府向法新社和日本放送協會進行了正式的駁斥。

14. “周——元五門採訪錄(1)‘人們想要恢復關係：日本應該明朗她的立場’”，朝日新聞晚報[東京]，(1971年11月8日)，第1頁；“中國在聯合國闡述其立場”，星報[約翰內斯堡，南非]，(1971年11月9日)，第5頁；“東京編輯對周採訪的節錄”，紐約時報(1971年11月9日)，第3頁。

15. 1972年12月14日澳門總督嘉樂庇致殖民部長庫尼亞密電，載“葡萄牙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71-1972年期間的政治關係：中國要求收回香港及澳門，PAA M. 1166，AHDMNE，Lisboa。

16. “種族主義防止中國的束縛”，英文虎報(1972年12月13日)。

17. “解放澳門”，星島日報[香港]，(1972年12月13日)，第1頁；“中國讓澳門自有——要求”，The China Mail[香港]，(1972年12月13日)，第1頁。

結論

我們從這篇關於20世紀後半葉葡中關係的短文中，可以得出甚麼結論呢？主要有兩點：首先，馬加良埃斯一直對中國大陸採取了非常克制和實用的態度，這是葡萄牙外交官的一貫作風。其次，從當時政權的利益角度以及其殖民政策而言，他所倡導的對北京政府的方針沒有得到預想的實際效果。

參考書目

Fernandes, Moisés Silva (2004), 中國與澳門：中葡關係範疇內的澳門文化革命的起源及其影響 (未刊).

Fernandes, Moisés Silva (2002), “弗朗哥·諾格拉1964年為葡萄牙與中國大陸建立外交關係所作的無果而終的努力”, *Revista “Administração” de Macau*, vol. 15, n.º 56 (Junho), pp. 559-602.

Fernandes, Moisés Silva (2000), 中關係範疇內澳門概述1945-1995：編年及文獻，里斯本Fundação Oriente.

Kim, Samuel S. (1979), 中國，美國及世界秩序，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Lucena, Manuel (1999), “奧利維拉”，*Dicionário da História de Portugal*, vol. 8, António Barreto e Maria Filomena Mónica, coords., 里斯本，Livraria Figueirinhas, pp. 631-639.

Magalhães, José Calvet de (2005), 馬加良埃斯訪錄：葡萄牙對外政策當中的歐洲主義者及閉關自守者，里斯本，Editorial Bizâncio.

Magalhães, José Calvet de (2004), “採訪錄”，兩個世界之間的澳門，Fernando Lima e Eduardo Cintra Torres, eds., 里斯本，Fundação Jorge Álvares e Editorial Inquérito, pp. 147-165.

Magalhães, José Calvet de (2002), 充滿甜酸苦辣的外交，里斯本，Editorial Bizâncio.

Magalhães, José Calvet de (1999), “序言”，震撼澳門的58天，José Pedro Castanheira, 里斯本和澳門，Publicações Dom Quixote e Livros do Oriente, pp. 13-16.

Magalhães, José Calvet de (1996), 葡萄牙與聯合國：殖民問題 1955-1974, 里斯本, Instituto de Estudos Estratégicos e Internacionais.

Magalhães, José Calvet de (1992), 戰後的澳門與中國, 澳門, 東方葡萄牙學會。

Pepper, Suzanne (1978), 中國的內戰：政治努力, 1945-1949,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年10月1日葡萄牙外交及領事年鑒, 里斯本, Tip. Henry Gris.